

民初广东教育改革中的中西文化冲突^{*}

周 兴

〔摘要〕 1912~1913年的广东教育界,存在着新旧知识阶层两大营垒和中西方两种文化教育的力量。两大营垒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实际权益,及两种文化教育本身之间的显著差异,决定了广东教育界存在着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民初广东的教育改革,激化了这一矛盾,引发了全省教育界两大营垒之间、两种教育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我们从这一中西方文化急剧碰撞的具体个案中,可以透视到广东乃至全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变迁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 民初 广东 教育改革 中西文化 冲突

1912~1913年间,钟荣光领导的广东军政府教育司,为在全省引进与建立西方式的新教育体制,对当时广东的文化教育进行了一番改革;他们破旧立新的改革举措,直接冲击了封建士绅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旧教育,因而招至其拼命地阻挠与反抗。民初广东文化教育界新知识阶层与封建士绅势力间的激烈斗争,实是当时西式新教育与儒家旧教育之争;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碰撞与冲突,展现了近代广东新式教育艰难起步前进的历程。

一、广东教育司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各项改革

1912年5月,钟荣光接任广东军政府教育司长后,远猷硕画,“一意施行民主国教育”;他本着“学风之活泼吾取美国”、“学制之划一吾终取法国”的原则^[1],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制定了教育大纲,以发展新式教育为己任。当时的有识之士“咸谓其教育大纲深合社会状态,将来粤省学务当有起色云”。^[2]

教育司对民初广东教育体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办学宗旨与方针方面,努力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 钟荣光主张民主办校,常召集有关的办学人员商议教育进行之法;他对学界同人“关于革新本省学务之条约”,极愿

* 本文1999年1月22日收到

接受。^[3]教育司则要求各校：凡重大事项均须“由校长会同教员议定而行。”^[4]为集思广益办学，它还提倡各校师生成立评议会、恳亲会，并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体育会，以“助学校管理之不及。”^[5]

2. 在教材方面实行弃旧布新，锐意更新教学内容 教育司鉴于前清粤地用为儿童“最初训蒙课本”的《状元幼学诗》，专“以科名利禄”毒害青少年，“实于教育前途，发生无限之障碍”，故特咨请警察厅下令禁其出版发行。^[6]为使儿童接受新知识，它重印了陈荣衮在清季为开明智而编的《改良绘图妇孺三四五字书》，作为小学生的启蒙读本。教育司还通飭各地在进行通俗教育的宣讲活动时，应讲民国共和新书，使“讲员所称，务与改良社会宗旨不相违背”。^[7]

3. 在教育培养目标方面，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司为改变前清学生于“读书而外不知培养道德、操持体魄”的流弊，^[8]通飭各校教师应注意“训练学生提倡德育，毋稍怠忽”；^[9]钟荣光常强调学生要“体育……德育、智育相辅进行。”^[10]教育司还要求各校开设运动课，及增设图工、缝纫、农业、烹饪等课程，使男女学生人人“有生活之智识技能及健全之体魄”，^[11]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4. 在教育发展规划方面，主张普通、实业与社会教育并举和男女教育并重 教育司颁布的督学局章程明确规定：各属的督学局应负责举办“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之事务”。^[12]教育司在采取措施努力恢复与发展中小学普通教育的同时，又大力推广社会教育，使“年长失学之人，普受教育之益”。^[13]钟荣光还鼓励各县督学局长“照章另设女子高等小学”，^[14]并强调民国教育“尤应养成一般女子皆具普通知识”。^[15]

5. 在教学方法方面，注意倡导与推广启发式的直观教学法 1912年8月，教育司邀集地方督学局长开了一次全省教育大会，并在会间组织与会者参观了教育博物馆、植物园等处。教育博物馆内陈列的教学书籍、学校规制、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生理模型及电化声光实验器材等展品，令参观者大开眼界和获得了新知识。钟荣光在谈到这次现场观摩的意义时指出：“凡此种种，皆新教育所应有，而广州市尚少见，各属更未有闻，不得不由教育司首先提倡”。^[16]这次观摩活动对启发各属学校推广直观教学法，无疑具有示范的作用。

6. 教育司对学校的教学管理也进行了不少的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有：重新划分学区，进行教育行政机构的调整；派员查明各属学校的情况，实行去劣存优；划一各类学校的称谓及各校学生年级的编制；根据实际需要增减学校的课程；调查市学龄儿童人数，拟施行强迫教育；实行小学男女学生同校；试行教员按周授课时数的多少及不同单价来计发月薪等等。

众所周知，重视发扬民主精神，注重人才的全面训练与发展，提倡采用直观教学法，大力普及与发展包括女学在内的全民教育等，这些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们从广东教育司民初全面破旧立新的教改实践中可以看到，钟荣光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影响熏陶的新式知识分子，把改革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旧教育和建立适合于民主共和制要求的资产阶级新教育，视为一项急不可缓的任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力图在广东引进与确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绘制出了广东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蓝图。《民生日报》曾对此作过这样的评论：“钟荣光自任教育司（长）后，整顿学务，昕夕不遑，固人人所共见”；^[17]方今全省学务“规划之宏大，进步之勇猛，隐然具新气象焉。”^[18]显然，民初广东的教育改革紧跟了那时“新教育兴、旧教育灭”的社会革新潮流。^[19]

二、教育改革对儒家教育及封建士绅的打击

民初广东教育界进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场争夺教育阵地的革命。革命新知识阶层把破旧立新的改革锋芒，直指向儒家的旧教育制度；他们的各项改革举措，对长期占据教育阵地的封建士绅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沉重地打击。

首先，教育司废除尊孔读经的决定，及其禁用旧历书、通行阳历等易风移俗的举措，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儒学及其礼俗在教育界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钟荣光任教育司长后，不仅强调“废经为中小学计”，^[20]遵原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在全省的中小学校废止了读经课，而且他还与萧友梅等人向北京的教育大会提出：“凡公立学校及幼稚园，不得在校内供奉偶像神牌”，主张在校内停止拜祀孔子。^[21]这些破天荒的举措，完全否认了孔学作为封建官学的统治地位，彻底打倒了孔子的至圣先师的神圣权威，从而动摇了儒家教育的政治基础。

广东教育司下列几项涤除旧染与转变社会风气的举措，表明了它革除儒家封建礼俗、向民众灌输科学新知与民国常识的决心。教育司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 禁用宣扬封建迷信的旧通书，颁行通用阳历的“同俗历书”。该新历书“添入世界之新事业，本国之新建设，凡为人民所当知者，附于日历之前后”，^[22]于1913年印行。2. 通令学校改用阳历和遵军政府规定取消传统节日休假。1912年，教育司曾指令潮州的孙廷臣：宣讲所简章中不能有端午节、中秋节放假之规定；1913年春节前，它又通飭各校曰：“民国改用阳历……各校学生有于阴历新年告假者，一概不准，其有未经准假而擅去者，即以违背校规论，由校长严于惩戒，藉以尊崇民国正朔，革除旧染污习”。^[23]3. 支持有识之士组织维持风俗会及婚姻劝导改良会，大力倡导各地改良社会陋习和树立社会新风气。

其次，教育司整顿健全全省教育行政机构、强化自身领导地位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士绅在旧教育界的统治地位，摧毁了儒家教育的社会基础。钟荣光整顿教育领导机构的工作先从教育司本身做起。他甫任司长即裁汰全司课员30多人，并将原专门、普通、图书3课合并为学校教育课，选派留美教育学硕士唐萱任课长；保留原总务课，派周桂年任课长；新增设社会教育课，委任留美法学士学位梅鹏海为课长。接着，他请准都督胡汉民裁撤广州及各县的教育课员，另在各属设立整顿学务的机构督学局，并规定“督学局为教育行政机关，局长受责于广东教育司，提倡及整顿局治范围内一切学务”。^[24]广州市及各县的督学局成立时，钟荣光委派的局长多是新人，而将一批封建士绅拒于督学局门外。

为了排除封建士绅对新教育的干扰破坏，教育司在整顿全省的教育行政机构时，重新划全省为14个学区，并“将从前属府道州所管辖之中学，收属省立”，以资整顿。^[25]如韶州、肇庆和南雄等属“各中学的校长，向由旧绅盘踞，不知学务，教员多业同类”，其校董也由所属各县举出的士绅担任；他们食宿在校，“不止耗费薪水，而且扰乱学规”，导致校风不正。钟荣光下令将这些中学“收归省立”时，撤换了一些士绅出身的校长，“由司陆续派人接管，厉行改革”；他为打击封建士绅势力，重新委派了顺德、新宁、香山等各县中学的校长，从而使“全省中学，稍稍就理”。^[26]

这期间，教育司还对直属的省校及广州的私立小学，进行了整改。如省优级师范的校长黄锡铨极少过问校务，致使教员随意告假，学生纪律松弛，校风日坏。钟荣光“为振作全省师范起见”，下令将黄辞退，改派唐萱兼任校长职。唐“到校后大行改革，教授管理崭然一

新，教员学生感情尤厚，一洗前清官校上下阻隔之弊”。^[27]为了改变封建士绅安插亲友任私立学校校董事、司事等职的腐败现象，钟荣光在司署内设立了广州私塾改良会，试图将私立学校改造为新制学校，可惜此举收效不大。

再次，教育司扫除学界科考污秽以整顿学风的指令，及其取缔各地士绅霸收学谷花红的决定，剥夺了封建士绅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科举这一儒家的教育考试制度，在前清时仍很盛行，封建的牌匾、旗杆、牌坊等科考功名污秽遍及广东城乡各地。1911年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为打击封建绅权，曾明令取消功名伪职和销毁牌匾旗杆等物。由于封建士绅对此令大多阳奉阴违，各属的旗杆牌匾等仅“取消其名，仍留其迹”；^[28]一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也“染前清科举遗毒”，有将“毕业视同科目，散派报红，谒祖树桅”的劣习；^[29]不少士绅凭借其功名特权及社会威望，依然霸收祖尝学谷。这些皆大大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钟荣光出任教育司长后，为彻底扫除粤省学界的封建污秽和劣习，大力地进行了以下两项工作：

1. 狠抓破旧立新的学风建设，厉行销毁科考功名的旗杆牌匾等物，以打击封建士绅的政治特权。1912年6月，钟荣光在请求都督胡汉民明令扫除学界污秽的呈文中，痛陈了封建旗杆牌匾及科考陋习对广东新教育的巨大危害：“现在关于观感而为教育前途大障碍者，莫甚于祠庙之牌匾旗杆等物。……科举功名之遗毒，仍然触目皆是，后生小子未入学堂，早受此传染；所谓世家大族，更挟此而渔肉平民，阻压新政，使教育大受障碍。应请通飭各属地方官，所有城市乡村、祠堂家宅挂有从前举人、进士、翰林一切伪职牌匾旗杆等物，立令销毁，不许遗秽；……尤有请者，近来毕业生新任官长，其中仍有旧习未除，虽不敢公然悬匾树杆，惟尚有书写灯笼，散派报红，售其饰智惊愚之术，应请一体严行禁革，以正民德而维风尚。”胡汉民随即将钟之呈文批转给各县长查照执行；令曰：“此等祠庙内之牌匾旗杆，及书写灯笼、散派报红陋习，自应一律销毁禁止，以平阶级而正人心。除批复外，此谕知该县长即便遵照，出示晓喻，认真查禁，毋任稍留旧染”。^[30]此令颁布后，《民生日报》对之大加称颂，指出“世俗所许为名乡望族者，以此旗杆牌匾；亲戚所称为光宗耀祖者，以此旗杆牌匾。父兄以此勉子弟，师长以此励生徒……科举之毒人甚矣哉！不意民国成立，学堂毕业生犹复旧习未除……亡清科举之头衔，印入学生之脑根，诚教育前途一大障碍也。今都督、教育司将亡清旗杆牌匾一律销废，我国学风或有转机乎！”^[31]

2. 严令禁止各属士绅因循陋习霸收祖尝学谷及书田花红，着将此款拨为各地兴办学校的费用，以打击封建士绅的经济特权。《民生日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花红也，书田也，种种名目，皆从前腐败乡绅假此以为霸占祖尝公产之一手段而已”。^[32]钟荣光任教育司长后，为改变各属士绅公然假公肥私、收取学谷花红、踞款阻学的状况，于1912年6月请胡汉民下令将从前“绅士占学田领双胙陋习，亦概行取消”。^[33]各县的顽固士绅不仅对此令置若罔闻，而且有的还为争领学田花红酿成械斗惨剧。教育司针对这一情况训令各县县长谓：“务将前项各款悉遵通令，拨作开办家族学校经费，倘有人格卑劣，藉学校毕业之名，争收学田花红者，一经查实，即将文凭先予撤销，追缴所收租谷，分别惩究，以息争端而重学款”。^[34]这期间，钟荣光还多次飭新会、顺德等县的县长查办当地劣绅霸收祖尝学谷、踞款阻学的事件。不少县长和督学局长都态度鲜明地执行都督与教育司的令示，通告“嗣后祖尝学田，均留为办学，不准举贡及毕业生等以私人名义支取，尤不准族内痞棍无赖藉词摊分。倘有卑劣人格，藉学校毕业之名，争收学田花红者，一经查实，即将文凭先予撤销，以息事

端而重学款”。^[35]全省当时在提款助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由上可知，广东教育司为建立发展新式教育开路的各项改革举措，对儒家教育及封建士绅势力进行了全面地打击：它不仅完全否认了孔子的神圣权威，及儒学长期作为官学的传统地位，从而动摇了儒学统治的政治基础；而且它还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士绅在教育界的领导地位，剥夺了其政治特权与经济利益，进而摧垮了儒学统治的社会基础。不破不立。钟荣光领导的教育司在广东教育改革中对封建儒家教育制度全面地“破”，是为了让引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式教育能在广东更快更好地“立”。

三、封建士绅对广东教育改革的阻挠与破坏

广东的封建士绅势力依恃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拼命抵制与反对广东教育司所推行的各项改革；他们为保住自身既得的政治权位与经济利益，顽固地维护儒家的教育制度与封建绅权，同资产阶级革命新知识阶层争夺广东的教育阵地。

首先，封建士绅竭力反对钟荣光等废除广东中小学祀孔读经的创举，肆意攻击钟“扬耶（稣）抑孔（子）”，一度掀起轩然大波，陷钟于窘境。钟荣光早年在科考中曾先后中过秀才、举人，本是一位饱受儒家文化教育熏陶的士大夫。后来，他因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香港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名“灵魂荣归基督永生”的虔诚教徒。钟荣光任广东教育司长后，在中小学废除了崇拜孔子偶像和读经课。封建的卫圣捍道者对此深感“有‘异说流行，斯文将丧’之忧”，^[36]他们给钟罗织了一个“扬耶抑孔”的罪名，指控他要以西方的基督文化来排除与取代中国的孔孟儒学。当时，高要县的士绅公然“谓钟通饬各校取消尊孔，否认其为教育司云。……谣言一出，陆续致省会及都督之电文，多至数十起……乱呼乱叫”。^[37]省议会内的士绅则“提议纠举钟”，其理由为钟是基督徒，曾“建议于北京教育大会扬耶抑孔”。^[38]广东的孔教卫道士们在攻击钟荣光的同时，又于孔子诞辰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恭祝孔圣诞辰”的祀孔活动，数千人“齐集商团操场联赴广府学宫谒圣”。^[39]钟荣光对封建士绅的攻击不辩一词，只在致友人书中指出：“仆司教育，非司宗教，无论何教决不由司提倡，亦不由司压抑，日后当自明白”，“今之攻仆者，别有原因”。^[40]原因为何？这就是封建士绅势力妄图借攻击钟荣光，来破坏广东的教育改革和阻挠新式教育的发展，他们妄图借维护孔圣人在教育界的权威，来达到保住自己既得功名、地位与权益的目的。由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内部对是否应废除祀孔也意见不一。教育司后在坚持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的基础上，对祀孔作出了让步。1912年9月下旬，它遵督令通饬各地学校“于孔诞日举行纪念，由校长、教员召集学生演讲孔子之道德学说，藉以训练学生提倡德育”，^[41]明确地要求学校应从加强学生德育修养的积极方面去纪念孔子。

民初广东教育司废除读经与祀孔的创举，是当时革命新知识阶层在文教领域内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此举招来封建士绅的疯狂抵制是不足为怪的。广东教改中“孔教案”的出现，既是革命新知识阶层与封建士绅势力争夺教育阵地斗争的反映，也是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教育界发生冲突的表现——封建士绅攻击钟荣光“扬耶抑孔”，正好说明当时他们也看到了这种中西文化冲突的存在。

其次，各地封建士绅竭力反对广东军政府及教育司关于销毁旗杆牌匾、禁收学谷花红的告令，死命地维护其封建绅权。在科举时代，象征着功名职官的旗杆牌匾，是士绅赖以享有

封建特权的护符。广州《民生日报》论及此时指出：“曩日绅士之敢于争花红、收书田、领双胙者，何恃乎？恃有参天之旗杆、鎔金之牌匾，为宗族交游光宠耳”。^[42]正因如此，所以各属士绅无不视旗杆牌匾为命根，而拼命抗拒销毁这些学界污秽。1912年9月，新安县长何思明派士兵去拆毁文姓家族的旗杆等物时，该村的劣绅文为邦竟纠合无赖痞棍数十人围攻殴打执行任务之人；士绅抗令自保的顽梗态度，于此可见一斑！由于封建劣绅的阻挠，各地的旗杆牌匾“沿袭如故者，所在多有”。^[43]

封建顽绅对督司关于禁收学谷花红的告令，或置若罔闻，或阳奉阴违，各县士绅照旧踞款阻学之事屡有发生：东莞有陈鸿彬上书县长，以“养廉”为由要求依旧领取花红；茂名有李广盛自恃附生名目，强占瓜分祖尝学谷；阳春有何声琦、何声鸾等人依恃武生功名，霸收学租120余石；顺德有周炳槐藉前清功名，盘踞学田与霸收祖尝；潮阳有胡国藩身穿长袍马褂，公然收取花红；新会海外乡有陈寿彭、陈傅霖、陈朝晃等串通多数乡绅贿赂县长，联合霸踞书田与收取花红，当《民生日报》仗义执言，发表评论申斥陈等“贪鄙可哂，顽梗可诛”时，陈寿彭等竟以“绅界公言”名义写匿名信给报社，对主笔进行恫吓，声言要用炸弹、手枪“与诸君从事最后手段……方知绅界厉害”。^[44]在香山、潮阳两县，发生过杨、何、林等姓顽绅多次蛊惑地痞流氓，殴伤热心提款办学人员的恶性事件；其它各县也不乏顽固士绅踞款阻学的事例。各属封建士绅死守学谷花红不放，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儒家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功名特权。广东教育司及各县长对当时的踞款阻学者，大多作出了缴销文凭及追回学谷等处理，从而大大打击了顽绅们的嚣张气焰。

再次，封建士绅竭力反对钟荣光及教育司进行的教育行政改革，妄图藉此保持自己在教育界既得的权位与利益。他们反对教育行政改革的手段主要有二：（1）鼓动部分省临时议会议员提出裁撤督学局案。各属的督学局是钟荣光任司长后新设立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封建士绅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鼓动士绅议员以经费困难为由提出裁撤督学局案。此案后经省临时议会议决并咨转胡都督执行，于是各属的督学局遂于1912年冬陆续裁撤。这大大削弱了各县的教育行政领导职能，从而影响到各地的“学务乃不见进而见退矣”。^[45]（2）反对教育司改革学校的行政关系和重新任免校长。规划各学校的行政隶属关系及任免各校长，本是教育司职权范围内之事，封建士绅却往往借此兴风作浪。教育司将一些原属府道州所辖的中学收归省立时，各地的封建士绅即借此唆使各校闹事：“罗定、潮州，则有鼓众罢学之事；梅县（即旧嘉应州）则有开会演说反对省立、塌楼伤人之事”。^[46]钟荣光撤销省优师原校长职和改派唐萱任校长之令一出，顽固士绅马上表示反对，“始而炸弹队、锄恶团及某某团体来函，要求取消撤退校长之令”，继而有人利用唐校长开除不称职教师和允许学生演文明戏事“吹波助浪”，“肆口污蔑”，迫使唐“因是不安于位而去”。^[47]教育司重新委派顺德、新宁、香山等县各中学校长时，劣绅也煽起了抵制的“暗潮”，“坚持数月”才被平息下去。^[48]

再次，封建士绅千方百计地阻挠与破坏广东新教育的发展。他们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以下4种：其一是藉学渔利，败坏新教育的声誉。吴川县李斗垣借办学为名，添设银水、罗租、补足、报税、戏金、歌资、船头费等项苛杂。农民、船户等不堪其重抽而呈请都督恤民；胡汉民下令取消病民诸捐后，李等又以无钱办学为由破坏教育事业。其二是破坏女校，摧毁女学。1912年3月初，新会县城一批无赖在士绅等支持下，公然窜入崇德女校，将一切校具拆毁一空，致使学校成为空地一块，无法办学。其三为破坏私塾的改良工作。1913年春夏间，教育司在香山县进行私塾学务调查与登记注册工作时，谷都乡的劣绅公然煽动塾师逃避

填表注册，致使该地私塾遵令改良者甚少。其四为阻挠与反对进行社会教育活动。对“改革旧戏，奖励新戏”一事，“优界学界皆踊跃，所惜省教育会为旧学家组成，层生反对”，^[49]致使这项社会教育活动无法顺利开展。显然，封建士绅是破坏广东新教育的罪魁祸首，是广东发展新式教育的主要阻力。

综上所述可知，封建士绅对广东教育改革的干扰破坏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诬诋钟荣光“扬耶抑孔”，借孔圣人的威权来掀风作浪，而且还以煽动裁撤各属督学局、反对教育行政改革、抵制销毁旗杆牌匾、继续踞款阻学、直接破坏女校和私塾改良等行径，来对抗教育司推行的各项改革，阻挠与破坏新教育的发展。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旧教育制度，并借此以保住自己既得政治地位与经济权益。

通过以上全文的论述，我们看到了本世纪初中西方文化急剧碰撞的一个具体个案。民初的广东教育界，存在着新旧知识阶层两大营垒，及中西方两种文化教育的力量。主持广东教育改革的钟荣光等人，皆是一些受过西方文化熏陶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力图在广东引进、建立与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新教育制度，以之服务于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治；他们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教育改革举措，旨在为新式教育取代儒家教育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当时占踞广东旧教育阵地的一批封建士绅，在政治上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在经济上多是封建剥削者，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是儒学的代表者。他们为了保持自身的封建特权和实际利益，总是顽固地维护儒家的教育考试制度，反对在全省建立与发展西式新教育。新旧知识阶层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实际权益，西式新教育与儒家旧教育两者在教育思想方针、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发展规划、教学内容及方法等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就决定了广东的教育界存在着中西方文化间的矛盾冲突。民初广东教育司破旧立新的教育改革，激化了这一矛盾，引发了全省教育战线上革命新知识阶层与封建士绅旧势力之间，及新式教育与儒家教育之间的斗争。那时广东教育领域内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实质上是当时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广东乃至全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变迁的艰辛历程。

注：

[1][4][5][8][14][16][21][22][25][26][27][37][38][40][45][46][47][48][49]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广州，1913年版，第15，28，28，28，26，33，37～38，20，27，27，22，37，37，38～39，17～18，27，22，27，20页。

[2] 《外人称教育之得人》，《民生日报》1912年6月15日。

[3] 《教育司裁减无谓空文》，《民生日报》1912年5月23日。

[6] 《谕禁通书及幼学诗》，《民生日报》1912年6月22日。

[7] 《令各县知事劝导善堂董选员宣讲文》，广东档案馆藏《广东公报》(181/142号)；《教育司拟定宣讲所简章》，《民生日报》1912年9月12日。

[9][41] 《争祀孔者可以慰矣》，《民生日报》1912年9月23日。

[10] 《女子体育学校将成立》，《民生日报》1912年5月9日。

[11]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第26页；《培女学之根本》，《民生日报》1912年6月15日。

[12][24] 《广东督学局章程》，《民生日报》1912年6月19～21日。

[13] 《为年长失学者谋教育》，《民生日报》1913年7月9日。

[15] 《男女教育之平等》，《民生日报》1912年7月2日。

- [17] 《钟荣光四面受敌之原因》，《民生日报》1912年7月16日。
- [18] 《胡督去粤之理由及影响》，《民生日报》1912年7月12日。
- [19] 《新陈代谢》，《时报》1912年3月5日。
- [20] 《教育司答友人诘难书》，《民生日报》1912年6月21日。
- [23] 《不准学生于阴历新年告假》，《民生日报》1913年1月17日。
- [28][30] 《为学界前途扫尽污秽》，《民生日报》1912年6月21日。
- [29][43] 《川粤桂滇四省教育报告》(广东部分)，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057/50号)。
- [31][42] 《旗杆牌匾一扫而清快哉》，《民生日报》1912年6月22日。
- [32] 《今日尚有霸收花红书田耶》，《民生日报》1912年9月3日。
- [34] 《令各县知事公布所属学田花红等款遵令提办族学禁藉名争收文》，广东档案馆藏《广东公报》(23/32号)。
- [35] 《霸收书田花红者看看》，《民生日报》1913年5月26日。
- [36] 《再志粤省孔诞祝典之盛》，《时报》1912年10月18日。
- [39] 《粤省商团祝圣之热闹》，《时报》1912年10月17日。
- [44] 《告外海旧绅》，《民生日报》1912年10月1日。

Sino-Western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Xingliang

Abstract Between 1912 and 1913, in the Guangdong educational circle, there existed the old and new intellectual groups and the forces in favor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s of education respectively. The totally different values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wo camps and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in the two types of education were bound to cause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Guangdo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and triggered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camps and the two types of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circle of the whole province. This struggle is in fact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is cas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lash we can see the hard journey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Guangdong, and even in modern China.

(作者 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 教授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赵洪艳)